

# 历史思维的中国模式存在吗？<sup>\*</sup>

## ——一种跨文化的分析

王晴佳

---

**【提要】** 本文以黄俊杰教授对界定中国历史思维特征的反思为起点,讨论了历史文化与传统进行比较与对照的方式,并探讨一些新的思考方式。文章认为,文化比较通常引起两方面的情况(一种文化遭遇另一种文化后开始自我反思),并试图界定一种历史文化,如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国史学传统在西方被提出和感知时,它或多或少是被视作西方历史思维独特性的反例。鉴于西方学术在现代具有的霸权性影响,当今的中国历史学家也在抵制东西方的两分法。对这种两分法或两种文化的特征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其不仅相互有关,而且是暂时的。例如,当现代中国人显露出受到兰克史学的巨大影响时,他们基本上尝试去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过去,如18世纪的考据学传统,以适应变化的世界。本文主张,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赋予文化比较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特殊情境以历史意义,超越那些为重新评价某种文化中的确定要素而易被接受的特征,运用历史智慧,应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

### 一、介绍

在非西方世界,对西方强国从18世纪开始的扩张所触及的精神追寻和文化反思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对非西方人民而言,这一过程具有双重目的:寻求抵御西方入侵的路径,和在过去寻找任何可能的理由以解释面对西方挑战时的“软弱”与“不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发动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后,这种文化反思也同样发生在西方,尽管目的不同。在爱德华·萨义德后期的重要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我们被告知,“英国文学”这一概念,并非在英国形成,而是在其殖民地印度形成——是英国殖民者为了教导大城市中被殖民的印度人而构建的!<sup>①</sup>

当我们关注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时(这一领域不仅追踪西方历史意识的发展,而且说明西方与其他文化如何不同)发现,在对从古代到现代西方史学传统最早进行审视的人中,有

---

<sup>\*</sup> 本文原刊于《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46卷,第2期(2007年5月)。因篇幅所限,本刊转载时略有删节调整。

<sup>①</sup>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 1993, p. 42.

一位是乔治·G. 泽尔菲(George G. Zerffi, 1820—1892), 这是一个匈牙利流放者, 在伦敦通过独立奋斗成为历史学家。<sup>①</sup> 泽尔菲于1879年完成了700多页的《历史科学》, 这部著作不仅领先于爱德华·富特尔的里程碑式作品《近现代史学史》, 而且包含的范围更广泛。泽尔菲事先对日本的历史写作传统进行了研究, 认为其与西方的史学实践具有本质的不同, 因为后者的风格是科学的, 科学的历史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为了证明他的观点, 他还上溯到古希腊。事实上, 他被这种目的论研究所束缚, 结果连德国/兰克史学的兴起都几乎无暇提及, 而按照他的观点, 德国/兰克史学代表着科学历史学这条显赫轨道上的顶点。<sup>②</sup>

这个事例表明, 一种文化遭遇另一种文化后, 双方都会做出确定文化特征(相关的或比较的)努力, 一种文化只有在与另一种文化的比较中才需要确定自己的特色之处。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在审视历史编纂学的起源时认为, “可理解性是通过与另一方的关系建立起来的”。<sup>③</sup> 我相信, 通过运用史料, 这种暂时性和比较性会更好显示出来, 我将通过这种方法评论黄俊杰教授这篇令人深思的随笔。换言之, 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假设一种内生的关于历史思维的中国模式, 因为这样的假设没有考虑到其被构建时的特定情境和其被进行比较的相关点。正如上面两个例子所表明, 理解和描绘自我从本质上是与理解对方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 我很愿意参加这种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讨论。界定这些特征如何得以显著和出众有利于揭示比较史学的价值。

## 二、对话者的角色

在西方, 很多历史学家和历史思想家都表达了关于西方与东方历史思维差异的观点, 例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杰克·H. 帕朗柏。与黑格尔一样, 巴特菲尔德和杰克·H. 帕朗柏也把东亚历史编纂学传统作为一种反例。他们的观点类似于: 尽管中国建立了一种同样长久的历史写作传统, 但它更多地是被垂训主义所占据。作为结果, 中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历史资料时并不具有敏锐的精神, 他们也没有发展出一种完全成熟的历史意识形式。例如, 杰克·H. 帕朗柏在他的《过去的死亡》一书中, 认为中国人不能区分“过去”与“历史”。顺便提一句, 他的论题仍然在流行; 2003年《过去的死亡》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

① 可以说对历史文学的第一次考察是路德维格·瓦赫勒(Ludwig Wachler)的 *Geschichte der Historischen Forschung und Kunst 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Litterarischen Cultur in Europa*, 2 vols. (Göttingen: J. F. Röwer, 1812—1820), 在此我感谢约恩·吕森提供的信息。

② 《历史科学》1879年由 W. H. and L. Colingridge 在伦敦出版。大概十年后, 泽尔菲以《通史科学》为名将之再版。参见 Thomas Keinstead, “Inventing Medieval Japan: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1:1 (1998), p. 67, note 46. 泽尔菲写作该书的情况, 可参见 Numata Jirō, “Meiji Shoki ni Okeru Seiyō Shigaku no yunyū ni tsui te; Shigeno Yasutsugu to G. G. Zerffi, The Science of History”, (“The Importation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Shigeno Yasutsugu and G. G. Zerffi’s The Science of History”), *Kokumin Seikatsushi Kenkyū*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life),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1963, III, pp. 400—429; and Margaret Mehl, *History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 74—80. 关于乔治·G. 泽尔菲的生活与职业, 可参见 Tibor Frank, *From Habsburg Agent to Victorian Scholar: G. G. Zerffi, 1820—1892*, transl. by Christopher Sullivan and Tibor Frank, Boulder: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2000.

③ Michel de 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l. by Tom Conl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

再次出版,西蒙·沙马(Schama)和尼尔·弗格森为其作序。<sup>①</sup>

即便西方的历史学家还不改变他们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传统的很多观点(或者在总体上不改变对非西方历史编纂学传统的观点),中国历史学家似乎已经对应着西方的传统,周期性地反思他们历史写作的遗产。于尔根·科卡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不对称比较”,因为一旦某个历史经验被觉察和构建为“标准”,就几乎不再要求进一步的详细阐述;更多的精力被用于解释“例外”。然而,正如科卡所指出,那样做存在某种危险。<sup>②</sup>

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尖锐地反思中国的历史写作传统。例如,1902年,梁启超(1873—1929)出版了《新史学》,他在其中向作为传统中国史学支柱的古老的王朝史学实践表示了轻蔑,因其无法在国人中间唤醒民族主义。为了唤醒再三被西方强国(和新近的日本)击败的中国,梁启超认为国家构建方案对于恢复国家强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主张,历史写作应服务于这一目的,就像西方史学显示的例证那样。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在对现代科学文化的狂热鼓动下,中国史学家热衷于抨击传统。这次他们更多地集中于批评道德教导主义,他们认为,其导致了历史研究成果的不可靠。在这两种批评中,西方模式更多地是隐藏在背景里,与之相反,中国史学实践的凄凉失败则显得十分明显。<sup>③</sup>

当然,在这两个案例中,西方模式服务于有分歧的、甚至是相反的意图。在梁启超对“新史学”的热情呼吁中,他力劝中国史学家应使其著作能有利于民族主义的动机,因为在西方就是这样做的。然而,他似乎遗忘和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尽管在要旨与风格上不同,王朝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都受到政治推销和意识形态支持的困扰。也就是说,尽管研究范围扩展了(覆盖到国家进步而非仅仅是某位皇帝的作为),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同样受到政治利益的促动。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史学家推动科学历史学的过程中,他们被兰克及其学派所奉行的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所吸引。结果,他们忽视了兰克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保守主义。正如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简洁指出的那样,他们没有注意到,兰克历史编纂学的标志“档案研究”,“处处都是与将民族主义目标和捍卫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相结合的政治议程同时并进的。”<sup>④</sup>就中国史学家而言,这种失察可能是一种无知,也可能是一种深思。他们提倡西方模式的批评的历史编纂学,是因为他们也想重新发现和复兴所谓的“考据学”,即18世纪以来以对文献学基础上文本和历史批评的经验主义研究而著称的一场重要的智力运动。

尽管看起来不可避免甚至有必要,这样一种对中国传统所进行的选择性的、不对称的、

① J. 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② Jürgen Kocka, “Asymmetrical Historical Comparison: The Case of the German Sonderweg”, *History and Theory*, 38 (February 1999), pp. 44–50.

③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p. 42–66.

④ Georg Iggers,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and the Guiding Assump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thought”,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p. 234.

反对“标准”(即史学实践的西方道路)的表述,正如科卡所指出,仍是存在危险的。<sup>①</sup> 首先,它倾向于过度强调自我与他者的不同,而忽略他们的相似性。在对黄教授一文的评论中,吕森提醒黄教授和我们,“垂训的历史编纂学”,或者道德化的历史编纂学实践,并不是独特的中国现象,而是世界各地几乎都存在的古老传统,包括前现代的西方。<sup>②</sup> 第二,它倾向于把“标准”(西方的史学模式)偶像化和固定化,而没能注意到其内部的多样性和史实性。正如很多人所指出,不仅在前现代时期西方的历史编纂学传统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传统有相似之处,而且它的现代转化也采取了多种形式。<sup>③</sup> 另外,这种多样性不仅具有民族特征,例如,德国/兰克对英国自由主义编纂学传统的批评,而且正如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揭示的,这也源于个体历史学家更深层的语言和体裁上的偏好。<sup>④</sup>

### 三、形式与时间

如果前述讨论表明现代学者对一种文化传统的详细研究,例如,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往往导致一种相关的比较研究,这使我们有可能界定一种特定的、历史思维的中国模式并推测它的特征。一旦从比较视野进行审视,历史意识的中国模式就显得突出和独特。尽管不是一种明确的比较研究,黄教授一文已经为我们展现了有趣的尝试。黄教授文中讨论了中国的时间观念,因为正如他在其他场合详细说明的那样,在这方面中国的历史思维有其独特之处。时间观念对于西方历史思维的形成也很关键,这在现代西方吸引了众多哲学家的广泛关注,最著名的就是马丁·海德格尔。<sup>⑤</sup>

黄教授一文成功地指出了中国历史思维的一些非凡特征。下面,我将通过重建这些特征的适当联系而赋予其历史意义。我也将讨论一些似乎未能引起黄教授注意的特征。我的讨论通过比较进行,西方并不是惟一的参与者。首先,我同意黄教授把历史意识界定为对记忆过去并评价其意义及与当前相关性的一种兴趣,这一点深深内含在中国文明的历史之中。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历史意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其特点是阶段性和(有时)显著的进展——换言之,有其自身历史。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中,即在孔子时代

① Jürgen Kocka, “Asymmetrical Historical Comparison: The Case of the German Sonderweg”, *History and Theory*, 38 (February 1999), pp. 48–50.

② See also Jörn Rüse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Narrative Structure, Moral Education and Ontogenetic Development”, in Peter Seixas, ed., *Theoriz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pp. 63–85.

③ 彼得·伯克曾经提出他认为西方历史意识可以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史学实践的10种形式。但是伊格尔斯和其他人指出,伯克的归纳是目的论的,因为这10种形式大都源于现代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经验,而非源于更早的时期。参见 Jörn Rüsen 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2.

④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⑤ See Chun-chieh Huang, “‘Time’ and ‘Super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Jörn Rüsen, “Making Sense of Time: Towards a Universal Typology of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Q. Edward Wang, “Time, History and Dao: Zhang Xuecheng and Martin Heidegger”; in Chun-chieh Huang and John B. Henderson, eds., *Notions of 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44, 131–156. Also see Chun-chieh Huang and Erik Zürcher, eds.,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 Leiden: E. J. Brill, 1995.

(ca. 551—479 BCE), 重点集中在保存对过去的记忆, 类似于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希腊对波斯的胜利那样的做法。

尽管孔子怀念过去的时代并认为其十分理想, 但他并没有遗忘那些划时代的差异和落伍的危险。事实上, 他的怀旧之情似乎使他更为重视落伍的危险。例如, 他敏锐地(痛苦地?)意识到他自己的时代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已经变得显著不同。

虽然看似不精致也不成熟, 但这种落伍在随后的时代反复出现, 例如在公元3世纪汉朝的衰落, 历史时间发生根本变化的意义是显著的。11世纪的宋朝时期, 这种历史变化的意义取得了更加成熟的形式。这促使欧阳修(1007—1072)重写前朝史。完成修订后, 欧阳修并不羞于将这些著作重新命名为“新”史。在当时这样做的并非欧阳修一人。司马光(1019—1086)将现存的史学文本汇总起来, 完成了他的大部头作品《资治通鉴》。不可否认, 他的努力代表着整顿过去的尝试。当然, 司马光在他的过去中看到的“意义”显然与我们自己看到的不同。但是他的事业毫无疑问具有试图重新组织过去的目的在内。

一般认为, 传统的中国史学家深受司马光发展的模式之影响。有趣的是, 这种“垂训史学”不仅曾经在西方盛行, 而且在中国文化圈的其他地区也存在。18世纪依然有一种历史学的新形式出现在清代中国, 以致致力于恢复孔子时代的经典文化、放弃司马光及宋代人寻求解释的模式为特征。清代学者认为宋代学者不可信赖, 因为他们生活于相当晚的时期。这促使学者们追寻对过去的不同解释。<sup>①</sup>

中国历史意识的发展也表明, 历史学家不仅可以通过构建新的叙述形式来重组过去, 而且可以通过编年史和其他更加公式化、顽固的历史写作形式来进行。在孔子的诸多成就中, 人们认为他编写了编年史《春秋》。他用更加详细甄选出的一些词汇代替了历史记载中的另一些词汇, 以表达道德蔑视与政治谴责。换言之, 可能更重要的是, 由于对传统的敬意受到所处时代的物质条件的限制(例如, 纸的缺乏), 孔子并不想用新纪录来取代现存的记录, 也不想修改记录中内含的历史信息的要旨。但是, 通过改变记录中的关键词(例如用“谋杀”来代替“杀”以达到对犯罪者更强烈的谴责), 仍然能实现一种令人满意的效果。

作为一种历史编纂学的文体, 编年史在全世界很多历史文化中都被总结过特点。但在中国古代, 与传统智慧相反, 编年史并不是历史写作的惟一形式, 甚至不是主要形式。司马迁这位公认的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 开辟了创作《史记》的事业, 编年史开始失去其吸引力。司马迁的文体, 被后世的很多史学家采用,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翻译为“annalsbiography”(纪传体), 但事实上它主要由出色的叙述性传记构成。编年史遗留的影响仅仅是他的著作遵循着清晰的时间顺序。在宋朝, 中国的历史写作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司马光在汇编《资治通鉴》时复兴了编年史。然而此时的编年史已不再像孔子时代的不同记录的宝库, 更多的则是一种时间记录法。大约在同时代, 袁枢(1131—1205)发明了一种

<sup>①</sup>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On-cho Ng, “A Tension in Ch’ing Thought: ‘Historicism’ in 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4:4 (1993), pp. 561–583; and Q. Edward Wang, “The Rise of 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ast Asia and Europe”, *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 40:1–2 (Winter-Spring 2003), pp. 74–95.

新的叙述文体——“纪事本末体”——代表着试图描绘过去的新努力。

如果时间在西方文化中被理解为有限的和非永恒的——根据《福音书》，人类历史将在7000年内无情地走向终结、面临天启——古代中国人则把时间视作无限的和永恒的。孔子站在悬崖上，感叹崖下河中的流水，他指出，正如黄教授所引用的那样，“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sup>①</sup>换言之，与西方文化中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时间观念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时间观念永远包含自然或物质世界（对人类发展既是条件也是限制）。而且，对中国人来说，有这种无限的、永恒的参照能够使人类历史的短暂性和暂时性获得充分的阐述。

这种自然与人类相关的思想是在中国文明的发展中产生的。尽管中国人可能不是最早计算农历（根据宇宙中的周期变化）的人，但他们最早根据季节和宇宙的相应变化记录人类活动。<sup>②</sup>编年史成为中国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的自然选择，因为这使其能够记录自然界与人类世界发生的事件，评估它们的相互影响。这种思考的模式被本杰明·施瓦兹称之为“相关的人文宇宙哲学”，<sup>③</sup>表明了中国历史思维早期发展的特点。它的影响在现代中国文化中仍然是可识别的。相比之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则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方法的完美示范——他们的叙述生动地描绘出人类戏剧的展开，在功绩与失败、卓越与恶毒、壮丽与贫乏之间交替进行——但是这种戏剧性的效果经常是以时间的顺序和准确性为代价获得的。<sup>④</sup>

正如中国史学家后来发展了叙述历史的兴趣，中世纪初期，西方史学家也更加关注写作中的时间顺序。但是，两种历史陈述模式中内藏的紧张仍然具有告诫意义。现代史学家基本上坚持对超越编年史的叙述抱有偏好。简言之，如果在历史编纂学的编年和叙述文体中存在斗争，那么后者在世界各地都已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不过，正如黄教授在其文中总结的，如果中国的历史思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穿梭以达到互济”，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回到过去是有益的，这并不是为了复兴编年史，而是为了重临思想（即古代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和他们的“人文宇宙哲学”的世界观）得以产生之处。也就是说，尽管与过去的几个世纪（我们称为现代）相比，我们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对我们来说，仍然急需重视自然世界（在这个全球变暖的时代更是如此）。正如中国智慧告诉我们的那样，人与自然内在地、不断地契合在密切的关联中，中国历史编纂学为我们提供了掌握这一关键点的途径。

（作者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译者：董欣洁）

（责任编辑：景德祥）

（责任校对：董欣洁）

① Confucius, *Analec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05. 我采用的翻译与黄教授的有所不同。

② Masayuki Sato, “Comparative Ideas of Chronology”, *History and Theory*, October, 1991, pp. 275 – 301.

③ Benjamin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50; also John B. Henderson,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sm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assim.

④ Virginia Hunter, *Past and Process in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37 – 265; Donald J. Wilcox, *The Measure of Times Past: Pre-Newtonian Chronologies and the Rhetoric of Relative Tim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51 – 82. Also see Q. Edward Wang, “Time Perception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28 (1995), pp. 69 – 86.